



伪黎明

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英] 约翰·格雷◎著 刘继业◎译

任何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乔治·索罗斯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FALSE
DAWN

伪黎明

[英] 约翰·格雷◎著 刘继业◎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 (英) 格雷著；刘继业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

书名原文：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ISBN 978-7-5086-2687-1

I. 伪… II. ① 格… ② 刘… III. 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IV. 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037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Granta Publications under the title False Dawn.

Copyright © 1998, 2002 by John Gray.

Foreword © 2009 by John Gray.

John Gray asserts the moral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Granta Publications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

WEI LIMING

著 者：[英] 约翰·格雷

译 者：刘继业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 字 数：233 千字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0-2446

书 号：ISBN 978-7-5086-2687-1 / F · 2260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FALSE DAWN

推荐序

约翰·格雷先生的著作《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简称《伪黎明》）经刘继业博士翻译、中信出版社出版，再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著作，尽管它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8年已经问世，却似乎在评论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格雷先生的许多观点是正确的，富有预见性的，2007年起源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约翰·格雷先生之所以能得出许多耐人寻味的观点，与他研究兴趣的广泛以及研究问题的深入有直接关系。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名誉教授，写了十多本专著，内容涉及世界历史、政治文化、社会思潮、宗教理念、文学流派等方面，而《伪黎明》则是他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利刃，解剖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和现实。《伪黎明》所表达的思想敏锐，观点鲜明，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迄今被翻译成16种文字出版，其中包括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的中文译本。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8月，格雷先生决定再版《伪黎明》，并写了“前言”。此时的格雷先生显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在收获《伪黎明》中的研究成果。

格雷先生把“华盛顿共识”，即美国极力向全世界推崇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称做“全球放任主义”，并把人们对全球化的憧憬称做“伪黎明”，旗帜鲜明的立场可见一斑。在格雷先生看来，全球放任主义就是一味追求

发展经济的效益，却背离了发展经济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将人类社会引入黑暗的深渊。“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人类为市场服务”，这一论断可谓是《伪黎明》中的点睛之笔，它提醒人们，在“按市场规律办事”、追逐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千万别忘了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究竟为了谁。

《伪黎明》把自由市场机制的建立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形成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采取了三个决定性步骤：取消农业保护，建立自由贸易制度；改革《济贫法》(Poor Law)，强制穷人工作；废除政府干预工资制度。格雷承认，这套制度为英国带来了一个世纪的繁荣，也成为之后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模板。然而，其最终结果则是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格雷先生眼中，美国经济能够支撑住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高速增长，要感谢“罗斯福新政”；而欧洲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要感谢“凯恩斯主义”。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放任主义”改革让各国难以重返“凯恩斯主义”，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第一个案例是 1979 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她将政府控制的能源、钢铁、水电气管理、海陆空运输、银行、电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企业全部或部分私有化。第二个案例是 1984 年新西兰工党政府的改革，该政府决定让汇率自由浮动，放弃对价格、工资、利率、信贷的管制，取消出口补贴和进口限制，对国企进行私有化重组。第三个案例是 1982 年德拉马德里总统开始的墨西哥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削减政府开支，降低工人工资，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造。格雷先生承认，这些“放任主义”的改革，最初的效果都不错，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速加快，甚至出现了短期内实现工业化的“墨西哥奇迹”。但是，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和较长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考察，发现这些自由主义的改革均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拉

大，传统家庭结构遭破坏，社会犯罪加重，等等。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三个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执政党都失去了执政地位或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

格雷先生对全球化的看法也是值得回味的。他认为，全球化是“工业生产中现代化技术和各种形式的交流跨越各国贸易、资本、生产、信息的边界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是“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彼此联结构成相互联系的网络”，是“一个历史进程，它并不要求全世界的经济都必然平等且紧密地连成一体”。他特别强调，全球化不是一种终极状态，尤其反对将主权国家撇在一边的“超级全球化”。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一些跨国集团试图将主权国家边缘化，但是当今主权国家对于商业活动的调节能力或许比以往还要强大，主权国家的权威值得尊重。

格雷先生在《伪黎明》中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世界上不存在笼统的“西方型资本主义”或“亚洲型资本主义”。每个国家的版本都不相同，各自均有本国特色。英国、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具有很强的个人主义，其自由市场模式并不适用于欧洲大陆国家，欧洲大陆国家都没有经历过“放任主义”时代，它们的市场机制也不像英国、美国那样独立于社会机构之外，它们的家庭结构和财产所有权也不完全相同。日本资本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市场自由主义存在本质的区别。日本的市场制度更依赖于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公司与社团、政府的关系也更紧密。中国的市场改革不是效仿西方模式或吸收西方价值观，而是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主要依靠家族内部信任，中国的商业模式甚至与日本也存在深刻的差异。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成为稳定的港湾，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仍游离于全球自由市场之外。

格雷先生对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可谓“嗤之以鼻”。在他的笔下，美国的贫富差距、离婚率、罪犯羁押率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整个国家是

个“大监狱”。即使对美国的高生产率，格雷先生也有不同看法：如果把500万罪犯计入社会成本的话，也不算高。格雷先生还尖锐地批判了“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在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他认为，如果美国寻求将单一经济文明强加给其他所有国家，就可能将国家间可控的差异催变为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强调，新兴工业国不可能复制美国现代化早期的发展阶段，那样等于倒退。但美国很可能更顽固地将自身视为全球典范，拒不承认世界已摆脱美国控制。格雷先生最后的结论是，美国的全球放任主义失败后，欧盟将在新的世界经济框架构建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格雷先生为本书写的长达1万多字的前言。这是他在出版《伪黎明》十多年后，面对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再度深入思考的结果，其观点更加平衡、精辟，例如：“市场只是有用的工具，在运行中容易犯错，也容易被大众的妄念引入歧途”；“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受距离限制的新技术，但不能把西方价值观普及到全球，只会不可逆转地推动一个多元化世界的到来”；“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衰落是与苏联解体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折事件”；“全球自由放任主义这艘乌托邦之船如今已在自身阻力作用下搁浅”。

当然，格雷作为一位学者，总会受到资料来源、立场观点的限制而出现错误。在这里不仅是指他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某些观点不仅偏激甚至错误，而且在他应该熟知的领域似乎也犯了错误。他认为“日本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个人主义性质”。这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不符合日本的现实。如果说，日本没有像美国那样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还比较有说服力。这样的事例还有几个，留给读者们自己去辨别。不过，《伪黎明》这本书总体上还是瑕不掩瑜，很值得一读。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本书的译文。能够把外文书译得既尊重原意，又

让中国人清楚易懂，就很不容易了，而刘继业博士不仅做到了这点，还做到了语言相当精练，并尽可能增加文采。

李志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2月26日于北京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膊伸得更长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F.Scott Fitzgerald)

自由市场时代，一切都在不停变化，几乎找不到以往的痕迹，而今这一时代自身也在飞速从人们的记忆中滑过。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不断更新，在市场规律下，新产业、新职位、新体验纷纷出现又接连消逝。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的学说夸大其词地指出，被许多国家采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将战胜其他任何经济体制。

长期繁荣、失重经济、全球经济大稳定、市场新范式、平坦的世界等新生概念和其他一些雄心勃勃的设想被政治家、媒体、经济学家、银行家、学术机构以及貌似冷静的商人一遍遍地宣扬，以至于成为既定真理。人们愿意相信，将来经济不会突然崩溃，货币不会急剧贬值，政府不会激烈动荡，社会财富不会一夜间化为乌有，不会再有重新划分世界版图的地

缘政治冲突……总之，一切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灾难都不会再出现，所有的动乱都已经过去，任何关于未来可能出现类似景象的警告都被当做杞人忧天。

事实上，关于全球经济不会再次崩溃的观点才是天方夜谭。历史没有终结，而是在演进的科技与不变的人性相互作用中继续发展，以往的冲突面临新的转变。政府或许比以往更有能力获取信息，但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明智。如果政治家及其智囊人士相信经济繁荣会永远持续下去，那只能说明他们没有历史常识。资本主义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富有生产力的经济体制，但表现一直起伏不定。有人认为即便脱离政府调控，市场也能自我调节，保持稳定，要知道这种观点是在苏联解体后 20 年间盛行的荒唐而不切实际的世界观引导下提出的，其本身即存在问题。

在支撑了 70 多年后，对其国民采取高度控制的苏联突然解体，这一切都发生在两三年间且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这一看似坚不可摧的政权瞬间倒台，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接下来的时间，国际局势不可能保持稳定，更遑论世界将开启苏联解体后变革时代的序幕而可以永享太平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衰落是与苏联解体具有相似意义的重大转折事件。当然，美国不会像苏联一样解体垮台，而是很有可能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滑入类似于阿根廷那样长期衰退的局面，但也应该看到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阿根廷无法比拟的。因此，结果将会是美国在许多国家极力宣扬的资本主义模式遭遇寒流，甚至在美国本土都会如此，这一事件看来将对全球秩序的重塑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在本书第 1 版中，我这样写道：“今日全球放任主义机制可持续的时间甚至比 1870~1914 年的美好时代更为短暂，后者被世界大战的战壕终结了。”这一观点在 10 多年前还显得奇特，但从那时开始全球资本主义就出现了许多走下坡路的迹象。俄罗斯政府拖欠债务，高杠杆对冲基金和长期

资本管理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爆发危机，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强制下调利率，使得全球金融系统未受到大的冲击，但此举也导致经济出现大量泡沫，结果让美国自身变成大量对冲基金的接纳者，外资持续注入美国市场。

目前由于美国的经济泡沫破灭了，全球市场正在重新整合。在全球化进程有利于推广美式资本主义的时候，美国乐于推动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但在 2007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白宫理所当然地作出了限制进口的决策。奥巴马政府随后在 2009 年出台“购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对美国传统贸易保护主义的继承，早在 1930 年美国就曾出台《斯穆特-霍利法案》提高进口关税，引发其他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当然，这并不是暗示当今大国会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但目前世界范围的经济错位将导致长期地缘政治混乱。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人们的行为也不会出现奇迹般的改变。人民依然会寻求政府的庇护，而政府通常主要考虑自身的生存，对银行实施紧急财政救助使金融系统免于分崩离析，同时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延缓经济衰退的速度。但是泡沫经济的增长方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试图通过制造新一轮泡沫的方式来应对危机无异于自欺欺人，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逐步走向通货膨胀，在危机爆发前就已显现的资源稀缺局面再次出现，政局因此更加动荡。最终当然不会出现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机械照搬的局面，当前的危机具有真正的新特点，正是因为如此，不能简单说历史会重演。

市场的复苏不会如同 24 小时滚动播出的新闻那样迅速，世界在一些基础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环境已不可与过去相提并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和印度还处在西方的控制下，俄罗斯在斯大林主义的掌

控中，巴西则停滞在“休眠期”。随着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加速，地理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工业化进程遭遇环境瓶颈的制约，这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根本不存在的情形。此外，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也有所改变，20世纪世俗意识形态被极大地削弱了。这在一方面是件好事，至少纳粹不会再掀起世界范围的大规模运动；另一方面，大规模世俗化运动的溃退也使应对现实冲突更为棘手，因为取而代之的麻烦是激进主义与好战组织结合体（有时以宗教面目出现）的兴起，这些人坚信他们能够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显然，宗教激进分子关于“彻底颠覆现有秩序就能像变戏法似的根除人类弊病”的观念，就如同极端环保主义者认为“凭借可持续发展和可再生能源就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一样荒唐。

事实上，世界上的问题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全解决的。在过去20多年中风靡的全球化范式如今正不可逆转地走向衰亡。全球自由市场能够保持稳定只是基于其能够自我调节的假设，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整个经济体系已经非常脆弱，经受不起任何冲击。与以往相对疏离的世界经济联系相比，现今发生在某国或某领域的危机能够非常容易和迅速地传递到其他国家或领域，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导致全局性问题，而这正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如此深远危害的原因。到2008年后期，美国金融系统陷入崩溃，大型投资银行或破产或在政府救助下勉强生存，没过多久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美国及向美国出口的国家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全球市场步入衰退。

全球自由放任主义这艘乌托邦之船如今已在自身阻力作用下搁浅。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自由放任主义与其说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工具理念，而后其逐渐盛行，强大到任何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地步。自由放任主义虽然一直没有得以在全球普及，比如中国

政府就从未放弃对经济的控制权，但这一机制的扩展不是任何政府能够限制的。在此情形下，许多银行在全世界负债经营，其债务甚至远远大于所在国资产，这一结果导致 2008 年冰岛经济崩溃，英国、瑞士和其他许多国家受到的冲击也十分明显。脱离监管的金融机构所背负的债务远远超过世界经济的规模，全球经济因此失衡。虽然各国政府起初决意控制危机的破坏程度，但谈何容易，由错综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所制造的这一系统性危机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不良债券的规模，很多附加在这些神秘债券之上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存在，随着资产贬值和经济萎缩，黑洞还会不断扩大。世界经济面临陷入类似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债务通货紧缩”（debt deflation）的风险，即债务上升与资产价值下降致命地纠缠在一起。

当前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会区别于往日。各国已在尝试结成统一战线，如 2009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 20 国集团峰会，但大家在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上仍无法取得一致，即便能够达成共识，各国政府也缺乏足够力量恢复稳定的秩序。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中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执行扩张信贷和增加供给的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流动性和市场活力得到提升。但那时世界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在当前如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国若实施类似的政策将收效甚微，因为许多新投放的资金会流向国外，后果不可预知。只要全球化进程持续下去，凯恩斯派的政策就无大的用武之地，可政府在印制钞票方面却是大有可为的，而且似乎有不惜一切代价推动通货膨胀的劲头。如果这样，债务通货紧缩可能不会出现，但全球自由市场时代也必将进一步走向衰落。

自由放任主义建立在“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理性的”这一假定基础上，认为市场玩家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相互交易，使得市场在自我调整中保持平衡。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相信市场能够保持理性”的狭隘观

点走向了极端。数学公式或许在经济学模型的王国里永远有效，可是在真实世界中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准确预测市场。经济学家可以区分危机（通常解释为有可能发生）与不确定性，而在实践中我们却无法据此指定可能采取的措施去应付可能出现的结果。学术的辨别当然是合乎道理的，但在人类行为领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可以依据经济理论采取恰当的行动，问题在于，我们为应对危机所列的任何清单都有可能忽略事后被证明是关键的因素。

现代经济学家普遍不具有经济学赖以成形的历史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建立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他们并没有仅仅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生活，而是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不存在清晰的界线，法律规范的市场交易领域与自然世界发展领域是两回事。市场只是有用的工具，在运行中容易犯错，也容易被大众的妄念引入歧途。

近年来，以上不言自明且被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熟知的道理或被遗忘，或被忽视。在这一时期，实证主义盛行，它将自然科学尊奉为人类知识其他所有分支的模型，正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经济学逐渐与现实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经济学的变迁并没有对现实生活带来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战后的经济学家可能在研究中过于重视构建宏观经济模型，但作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他们至少明白用自然科学的概率公式来规划未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随后芝加哥学派兴起，该学派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坚定信奉者，并崇尚实证主义方法论研究，在其影响下经济学家的上述洞察力消失了，经济学变为一门以信仰为基础的科学，其实已成了伪科学。

诺贝尔奖得主、被称为“期权定价模型之父”的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曾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创始人，他们

经营的该公司对冲基金却于 1998~2000 年陷入破产重组的困境，因为其套利计算公式在理想状态下或许能发挥作用，但当极小概率出现或其预设投资组合中几种资产不再正相关时，就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小概率事件还是资产相关性，我们都无法预知，它们何时出现、呈现何种状态，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个谜。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在较长的历史阶段，这些事件曾经常反复发生，是绝对不能不管不顾的。

忽视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最致命的错误。在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中，20 世纪 90 年代末暴风雨前的平静期竟被许多经济学家当做太平盛世，他们的基金交易模型利用资产价格的微小波动套取巨额利润，要达到此目的，基金的杠杆比率必须非常高，而这同时意味着当超过预期的大幅价格波动爆发时，该基金极易受到致命的冲击。此外，这些经济学家录入电脑处理的历史交易数据仅能追溯到几年前，所以对于重创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主权债务危机，他们毫无警觉，更别提作出什么反应了。当然，人们不可能预知这场危机何时发生，它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反省错误就要明白，不能预测未来不算错，但盲目相信未来会迥异于过去、无法有效防止历史灾难的重演，这就是大错特错了。

人类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本可以在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归纳过去来推导未来，但至今难以做到。20 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 1921 年就著有《概率论》探讨此方面问题，并且穷其大半生时间构思“信仰的理性程度”理论，但在 1936 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在分析了诸如欧洲战争前景、铜的价格、20 年来利率变化、新发明的过时率等因素后断定：“任何可计算的概率都缺乏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无论如何，我们就是不知道！”凯恩斯这一怀疑性的结论与 17 世纪宗教作家、现代概率论创始人之一布莱士·帕

斯卡的观点遥相呼应。帕斯卡曾带有尖锐讽刺意味地问道：“概率性能够带来确定性，那么这一概率是多少？”帕斯卡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回答。

当前经济的崩溃并不仅仅是由不受监管的贪婪造成的，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类傲慢的结果。正如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①中指出的：“这场危机并不是一个本质上就无法预知的事件。”2006年塔勒布就预言了危机将如何发生：“我已看到政府支持的房利美集团面临的危险，它现在就像坐在炸药桶上，哪怕轻轻地打个嗝都可能出事。”塔勒布同时也指出：即便这场危机是真正的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人们也有可能从危机的旋涡中逃脱出来。比如，投资者可以选择只将小部分资金投入市场以保证其余资金的安全；政府可以通过立法禁止银行动用储户存款进行投机，比如美国1933年大萧条时期确立、1999年撤销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上做法并不是要将安全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告诫人们投机要在可承受的风险内进行。对于投资银行来说，当然可以参与高杠杆基金的游戏牌局，但首先要保证不能使用普通储户的资金，同时还要搞清楚如果玩输了，也不要指望得到谁的救助。

如果说全球自由市场之乌托邦性的一个表现是对人类知识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么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国际政治的权力和冲突的漠视。市场不是永动机，一旦建成就会永远运转下去，它只是存在瑕疵和矛盾的一套制度，如同其缔造者一样不完美。市场不仅易于陷入增长与衰退的周期循环，而且时常反映出交易者相互矛盾的目标和价值观。总之，市场系统与支撑它的权力一样不具有持久性。市场具有亚当·斯密所说的“物物交换”的特性，通过市场交易商品和服务，这是全球通则，无论在集中营还是在大型购物中心都是这样。但只有在产权得到保护、契约受到尊重的地方才能

① 《黑天鹅》一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9年8月出版。——译者注

培育出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而这些保障只能由强有力的政府提供，当政局垮台或政权衰败的时候，在其维持下的市场体系也将随之崩溃。

在谈论全球自由市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明白它是美国意愿的产物。美国通过其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将“华盛顿共识”强加到全球许多国家头上，该共识把健全货币与平衡预算说成是经济良性发展的试金石，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遵循此规则来制定经济政策。美国当然不愿受此规则束缚，事实上，美国很少让自己受限于任何正统经济学说，而是放任巨额联邦预算赤字年年攀升。“华盛顿共识”还要求全世界实现自由贸易，同样，这一指令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大国政治中，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径司空见惯，只要还在世界第一的宝座上，美国就会继续这样发号施令。

然而，当放松管制的银行纷纷破产，导致金融体系爆发危机之时，美国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国内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出现了问题，各种不稳定因素从四周向中央聚拢，这一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熟知的危机样式选择了美国作为祭品。正如我在本书 2002 年版中写到的：“在可预见的将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自身可能成为之前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在新自由主义历史时期，美国是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大厦的首席建筑师，现在自由放任时代行将结束，美国较之其他国家可能反而更容易受到脱离监管的金融市场的伤害。”

如今美国在许多方面更像是一个新兴国家，而不像是数十年前就已十分发达的经济体。美国的工业基地或消亡、或出售、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已所剩无几；公共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光鲜不再；房地产市场一片惨淡，部分住房被遗弃，原本繁荣的街道变成了贫民窟。与此相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已显现出乱中取胜之势，它们因此在政治上获得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经济成就。美国对银行的救助从布什政府就已开始，到奥巴马执政时期进